

冯天瑜◎主编

人文論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2011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冯天瑜◎主编

人文論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

2011年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论丛(2011年卷)/冯天瑜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61-0346-3

I. ①人… II. ①冯… III. ①社会科学—2011—丛刊 IV. ①C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43523号

责任编辑 郭媛

责任校对 郭娟

封面设计 毛国宣

技术编辑 李健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人	赵剑英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64073831(编辑) 64058741(宣传) 64070619(网站) 010-64030272(批发) 64046282(团购) 84029450(零售)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5.25	插页	2
字数	411千字		
定价	57.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学术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松山	瓦格纳	艾 兰	池田知久
刘纲纪	任继愈	朱 雷	谷川道雄
李学勤	杜维明	庞 朴	宗福邦
饶宗颐	章开沅	谢和耐	裘锡圭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礼堂	李维武	陈文新
陈庆辉	陈 伟	陈 锋	吴根友
沈壮海	张建民	杨 华	杨逢彬
罗国祥	尚永亮	郭齐勇	

主 编 冯天瑜

副 主 编 郭齐勇 陈 锋 陈文新 杨 华

执行主编 陈文新

执行编辑 余来明

目 录

历史文化语义学

“辛亥首义”考辨	冯天瑜(3)
学名 International Law 的汉译历程	聂长顺 傅 克(13)
新闻报刊与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兴起	崔应令(24)
戊戌变法与清末汉文西书教育术语	
——以《戊戌奏稿》为中心的考察	余冬林(34)
“格致、践履”的体悟：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马 健(45)

文史考据

从慈利竹书数字简看今本《吴语》的分章	何有祖(61)
曾侯乙墓竹简墨丁研究	罗小华(73)
从上博简《季康子问于孔子》看孔子晚年不仕的原因	梁 静(80)
先秦祓祭再探	
——兼论汉儒对经典的诠释及影响	任慧峰(87)
小议张家山汉简《具律》中所见“加刑”的两条原则	鲁家亮(98)

中国哲学与思想文化

论《唐虞之道》《忠信之道》中的道家思想	欧阳桢人(109)
论《周易》哲学中的“交”	连劭名(118)

《春秋繁露》与《淮南子》人性论比较

- 从董仲舒对孟子人性论的批评说起 程 郁(125)
- 郭象逍遥观探析 赵景飞(138)
- 论张载、吕大临对“性与天道”问题的探讨 文碧方(148)
- 从“变化气质”到“刊落习气”
- 阐释马一浮融摄儒佛的现代新儒学工夫论 刘乐恒(162)
- 论乾嘉学术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多重影响 孙邦金(180)

中西文化比较研究

- 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皇帝实录 谢贵安(205)
- 论康德哲学中的两种因果性概念 周浩翔(231)
- 山崎闇斋身心思想小考 铃木章伯(243)

中国文学与历史文化

- 对古代散文研究的再思考 熊礼江(261)
- 《窦娥冤》:文学经典与舞台经典的遇合 李晓彬(295)
- 明代科举与会元科名 周 勇(306)
- 改编删节求创新
- 论清刻《西游证道书》 吴圣燮(319)
- 《儒林外史》对于科举的基本立场 甘宏伟(352)

学术述评

- 马王堆汉墓医书研究综述 杨 勇(367)
-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大事记
- (2010年1—12月) 李小花(383)

历史文化语义学

“辛亥首义”考辨*

冯天瑜

公元1911年10月10日，按照干支纪岁法，那是辛亥年（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中国的历史到达了一个临界点：是日夜，武昌城枪声响起，新军暴动。10月11日清晨，起义军占领武昌，全城秩序井然。被武昌方面枪炮声惊动的汉口中外居民，11日下午从江边借助望远镜隐约看到：长江对岸武昌汉阳门^{〔1〕}城楼及蛇山头的警钟楼^{〔2〕}上，平日悬挂的黄龙旗已被一面别样旗帜所取代^{〔3〕}。是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俗称湖北军政府）成立，随即通电全国，发布《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布告》，宣布改国号为中华民国。自此，中国各种政治派别于震惊之余，竞相聚集力量，以应对事变。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社会大变革骤然而起。

* 基金项目：200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近代术语的生成、演变与中西文化互动研究”（07JZD0040）。

冯天瑜（1942—），男，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

〔1〕 武昌城九个城门之一，位于城北，由“都武而昌，得胜之地”一语获名。

〔2〕 光绪三十三年（1907）湖北巡抚端方在黄鹤楼故址后方修建一栋两层西式红色楼房，楼顶装有大型自鸣钟，此楼建在蛇山高处，可监视武昌城火警，故称“警钟楼”，为清末民国间武昌标志性建筑之一。1955年建武汉长江大桥时拆除。

〔3〕 此为革命党人制作的红地九角十八星旗。据当事人回忆，10月11日从汉口江边用望远镜只能见到武昌汉阳门及蛇山头警钟楼顶旗帜已不同于黄龙旗，但旗上图案看不清楚。而武昌居民10月11日即在阅马场湖北咨议局正门及蛇山头的警钟楼得见红地九角十八星旗。

一 辛亥首义：“共和”旗帜下第一次成功的城市起义

辛亥秋季的武昌新军起事，曾有多种提法，如武昌举义、武昌义起、民军起义、鄂军起义、武昌发难、鄂省举义等^{〔1〕}，史称“武昌首义”或“辛亥首义”。

“首义”一词由东汉哲人王充（27—97）创用，其意为首先揭示宗旨^{〔2〕}。以后，“首义”引申为首举义帜、率先发难，唐人杜甫、韩愈有此用例^{〔3〕}。“武汉首义”（或“武昌首义”）的正式提法，较早见于孙中山 1912 年 1 月 1 日发布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书云：

武汉首义，十数行省先后独立。所谓独立，对于清廷为脱离，对于各省为联合。^{〔4〕}

此后孙中山又多次议及此题，如 1912 年 1 月 12 日在《复参议会论国旗函》中称：“武汉首义，则用内外十八省之徽志。”“武汉之旗，以之为全国之首义尚矣。”^{〔5〕} 1912 年 2 月 8 日《令内务部筹划兴复汉口市场文》称“此次武汉首义，汉口受祸最酷”^{〔6〕}。1912 年 4 月 1 日在《批马伯援等呈》及《令财政部拨给武汉死义烈士遗孤教养所经费文》均称：“民国开创，武汉实为首功。”^{〔7〕}

1912 年 4 月孙中山访问武汉，屡次谈到武汉或武昌“首义”。4 月 11 日，在汉口熙泰昌茶栈武汉欢迎团欢迎会议上讲话时说：“武汉首义，阳夏

〔1〕 参见李启厚《应规范辛亥首义遗址的文字说明》（未刊稿）。

〔2〕 王充《论衡·正说》：“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

〔3〕 杜甫《别张建封》：“刘裴建首义，龙见尚踟蹰。”韩愈《平淮西碑》：“魏将首义，六州降从。”

〔4〕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 页。

〔5〕 同上书，第 17—18 页。

〔6〕 同上书，第 68 页。

〔7〕 同上书，第 316 页。

鏖兵，诸君子惨淡经营，既已推倒满清，达平时种族、政治均待革命之目的。”〔1〕4月12日，在同盟会湖北支部欢迎大会上说：“去秋武昌首建义旗，各省响应，不数月而满清已覆，民国以成。”〔2〕4月12日，孙中山离汉之际，留函《答谢武汉各团体布告》与《致武汉报界联合会函》，两次提到武汉首义。前者说：“文此次薄游武汉，得与我首义诸君子暨父老昆弟相见，无任感幸！”〔3〕后者亦称：“文于武汉首义之地，心驰已久。”〔4〕

仅从孙中山言论可见，“武汉首义”（或“武昌首义”）自民初已成定说，而并非首义诸人的自诩。而以10月10日为民国国庆日，是1912年9月以蔡济民为首的武昌起义将士赴北京请愿，北京参议院1912年9月28日全票通过决议：以武昌起义日定民国国庆日（俗称“双十节”）。该年10月10日在武昌举行首义周年纪念。

本来，武昌新军起义并非清末首次发生的反清武装暴动，称其“首义”别有深意。

自1895年10月孙中山率郑士良（1863—1901）、陆皓东（1867—1895）等举行第一次广州起义以来，兴中会、光复会及后来的同盟会于十余年间发动十多次反清武装暴动，诸如——

1900年由保皇派与革命派联手组织的武汉自立军起义（又称庚子自立军起事）；

1900年10月郑士良等的广东惠州起义（又称庚子首义）；

1906年12月同盟会策动的萍浏醴起义（又称丙午萍浏之役）；

1907年5月同盟会策动的广东潮州黄冈起义（又称丁未黄冈之役）；

1907年6月同盟会发动三合会在惠州七女湖起义（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

1907年7月光复会徐锡麟（1873—1907）联络会党举行安徽安庆起义（又称丁未安庆之役）；

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钦廉防城起义（又称丁未防城之役）；

1907年9月同盟会发动广西镇南关起义（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

〔1〕 见《中山先生住鄂记》，《湖北文史资料》1996年第1期。

〔2〕 同上。

〔3〕 《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5页。

〔4〕 同上书，第336页。

1908 年 3 月黄兴领导钦廉上思起义 (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

1908 年 4、5 月黄兴与会党首领黄明堂 (1866—1938) 发动云南河口起义 (又称戊申河口之役);

1908 年 11 月熊成基 (1884—1910) 等发动新军举行安庆起义 (又称戊申安庆之役);

1910 年 2 月倪映典 (1885—1910) 等发动广州新军起义 (又称庚戌广州之役);

1911 年 4 月, 黄兴、赵声 (1881—1911) 率同盟会精英举行广州黄花岗起义 (又称辛亥广州起义)。

上述反清暴动的模式大略相同: 党人在华侨社会及外国友人处筹集资金、武器, 编组敢死队, 对边境地区 (广东、广西、云南) 清方军政机关展开外科手术式的突击; 内地 (江西、湖南、安徽) 起事则多依靠会党或小股新军之力。

历次武装暴动, 皆称悲歌慷慨, 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 势单力薄, 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 此所谓“屡起屡蹶”。

相形之下, 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的燎原之势, 这并非偶然。

古有“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1〕}之说, 湖北革命党人秉承此种豪迈楚风, 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大有“亡清必楚”的雄心, 而此种雄心依托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扎实的准备工作: 武汉拥有近代工商业、近代文教、近代交通、近代传媒和近代军队汇合成的近代文明基础, 革命党又与起事城市各阶层联系广泛, 最重要的是, 革命党人实行“抬营主义”, 争取了成建制的新军, 并在军中建立完整的组织系统, 这一切皆非前此多次反清暴动所可比拟, 故虽然起事仓促, 却大体能遵循既定方略运行——

10 月 10 日傍晚一处举义, 诸营响应, 经一夜激战, 便夺取中心城市——湖广会城武昌;

11 日在湖北省谘议局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鄂军都督府, 首次在中国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行使职能的共和政权;

汉阳、汉口相继于 11、12 日光复;

〔1〕《史记·项羽本纪》。

11月初公布宋教仁（1864—1912）草拟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将共和宪政纲领昭示天下；

10月18日至11月27日，民军^{〔1〕}在汉口（时称夏口）、汉阳与南下的北洋清军主力鏖战月余，此为辛亥革命期间最大规模的战争。“阳夏之役”40天期间，湖北各州县竞起响应，湖南、陕西、山西、江西、江苏、广东等省纷纷反清独立。

故“辛亥首义”之“首义”，第一层含义是首次举义成功。

“首义”的第二层含义是，经武昌新军暴动的沉重打击，沿袭268年的清王朝及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之倾覆成为定局。

“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更在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年秋季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各省纷起景从响应，正所谓——

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2〕}

此诚为首创性义举，故史称“辛亥首义”。

威廉·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在《城市与地方层级体系》中提出清末的中心地理论及其分析方法，根据市场交易的规模和兴旺程度，将中国村庄以上的聚落分为：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地方城市、中心市镇、基层市镇。^{〔3〕}而处于中国国内贸易最高地位的汉口，兼具中心都会、地区都会、地区城市、较大城市的功

〔1〕 自1911年10月12日“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以后，起义军称“民军”，意谓中华民国之军，与清军（又称北军）相对应。

〔2〕 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页。

〔3〕 威廉·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城市与地方层级体系》，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版。

能。在这样的近代中心城市爆发的辛亥首义，在两个关键环节上开创先机：

(1) 以武装暴动击碎两百余年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终结沿袭两千余年的专制帝制。

(2) 以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和《鄂州约法》的颁布，昭示了近代意义的民主共和政治模样。

这一破一立的两个侧面，虽然都留下种种未竟之业，有待后人继续努力，但其开辟之功都是前无古人的。

二 短时段“首义”造因于中长时段社会变革

武昌新军暴动事起仓促，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首脑也或避（如刘公）、或伤（如孙武）、或亡（如刘复基）、或在逃（如蒋翊武），事变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

然而，偶然寓于必然之中——

武昌起义能够吸引那样众多的新军士兵参加，举义者能够迅猛而有序地展开战斗，有条不紊地占领省会城市，及时建立新政权；

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能够立即拿出一系列文告，将革命宗旨宣布天下；

武汉三镇及湖北各府县民众能够那样迅速而热烈地起来响应革命；

湖北军民在湖南等省支援下，有力量同前来讨伐的装备精良的久练之师——北洋清军周旋于江汉之滨、龟山之麓达四十多天，从而为各省“易帜独立”赢得宝贵时间……

这一切则无法用“偶然性”一言以蔽之。

当我们考察 19 世纪末叶以来中国（尤其是中心城市武汉）出现的新的经济结构、新的社会阶级和社会思潮，追溯湖北革命党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遵循孙中山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在乡邦所作的英勇而坚实的努力，进而注意地望形胜，便会发现，辛亥首义绝非从云端掉下来的幸运之果。

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

1985) 提出历史研究“时段”理论,即区分地理时间(长时段)、社会时间(中时段)、个体时间(短时段),又将三者分别称为“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和“事件”(evenements)。主张重视地理时间(“结构”)、社会时间(“局势”)对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个体时间(“事件”)为结构与局势所左右。而传统史学较多注目于“个体时间”,主要用力于重大政治事件、外交活动、军事征战等“短时段”事变的研究,这显然是有缺欠的。今日我们作辛亥首义史考辨,必须超越狭隘的政治史观,将视野投射到近代社会转型全貌,从结构、局势、事件的辩证关系探索这一历史事变的生成机制。

费正清(1907—1991)编《剑桥中国晚清史》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论点:

最好是把辛亥革命理解为二十世纪社会革命中的 1900—1913 年阶段,不应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 1911—1912 年阶段。其次,根据这种广义的概念,革命者的重要性远远不是象旧说法所认为的那样。^{〔1〕}

主张将辛亥革命史追溯到 1900 年以来(约为清末新政时期)发生的社会变化,此说有理,但还应当扩大视野。

考察辛亥革命,当然需要细致入微地梳理 1911—1912 年间发生的“短时段”剧变,但还须追究其背后的“中时段”社会结构造成的久远影响,考察 19 世纪 60 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考察 1889 年张之洞(1837—1909)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 20 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造成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还要考察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起承转合。

治史者当在全面观照“结构”(structures)、“局势”(conjunctures)制约“事件”(evenements)的前提下,特别注意社会时间(中时段)对个体时间(短时段)的影响力,注意这种影响的复杂性。例如,张之洞殚精竭力主持“新政”,是社会时间(中时段)发生的大事变,张氏操办湖北新

〔1〕 [美] 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517 页。

政, 主观动机当然是维护清王朝及纲常名教(其所著《劝学篇》内篇有明白宣示), 然而, 这些近代性事业导致的客观后果却出其意表之外。

仅以练新军而言, 张之洞为的是“执干戈以卫社稷”, 他于 19 世纪末叶派遣姚锡光(1857—?)、吴殿英(1842—1907)、张彪、黎元洪等赴日本学习近代教育(重点在军事教育), 随后又派吴禄贞(1880—1911)、蓝天蔚(1878—1922)等武备学堂学生入日本军事学校留学, 由此获得编练湖北新军的模式, 试图以一支装备、训练西洋化的军队挽朝廷衰败于既倒。然而, 这样一支初具近代文明属性的湖北新军, 却不以张氏意志为转移, 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温床, 至辛亥革命前夕, 湖北新军士兵约三分之一参加革命团体, 三分之一受其影响, 仍然被清方掌控的不足三分之一。辛亥首义是一次从新学堂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在近代城市军营发动的新军起义。而“近代城市”、“新学堂”与“新军”正是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的产物。孙中山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 于 1912 年 4 月来武汉访察, 睹物晤人, 发现正是直隶南皮人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 为辛亥首义奠定了物质基础, 准备了人材条件, 故孙氏由衷感慨:

以南皮造成楚材, 颠覆满祚, 可谓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1〕}

可见, 孙中山并没有把辛亥首义之因由, 仅仅归之党人的活动, 他还把视线投向了较久远、更深层的社会变革层面。

曾入读两湖书院、由张之洞派往日本游学、后任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前身)校长的张继煦(1876—1956), 将辛亥革命成功于武昌的原因归之于张之洞治鄂奠定的近代文明基础。张继煦指出, 革命并非张公所愿, 却是张公事业所导致, “虽为公所不及料, 而事机凑泊, 种豆得瓜”^{〔2〕}。

孙、张二氏所论, 其意都在肯定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为辛亥首义准备了物质及人材条件, 揭示了“中时段”社会更化对“短时段”革命事变

〔1〕《时报》1912 年 4 月 15 日。

〔2〕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一)“文襄督鄂之时代及其环境”, 湖北通志馆 1947 年编印。

的奠基作用。所以，在充分注意“中时段”的同时，“长时段”地理因素对革命事变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三 历史合力

辛亥首义是同盟会及其下属地区性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组织领导的，辛亥首义史理当详论革命党的组织活动、宣传活动及起义实践。然而，辛亥首义爆发以及之后的走势，又绝非单由革命党人所左右。通观历史全过程，辛亥首义及其演进与终局，是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从清朝离析出来的汉官、袁世凯集团、清廷满洲亲贵、西方列强等几种力量相互博弈的产物，背后更受国内、国际局势所左右。

恩格斯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他指出——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

辛亥首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历史事变，正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如作为武昌起义直接先导的保路风潮，即由立宪派发动，四川谘议局的蒲殿俊（1875—1935）、罗纶（1876—1930）、张澜（1872—1955）等，湖北士绅刘心源（1848—1917）、谘议局汤化龙、新军协统黎元洪，是保路运动的领袖或赞助者。他们在辛亥首义前的活动，理当进入辛亥首义史的视野。

又如湖北军政府的建立及运行，充满革命党人与汤化龙等立宪派、黎元洪等原军政官员彼此互动、角力的故事；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南北议和，及让权于袁世凯，更是全国范围内多种势力较量、组合的结果。“历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7页。